

19 世纪 30—40 年代犹太教改革者与正统派的论争

胡浩*

【摘要】19 世纪 30—40 年代是德国犹太教改革力量同宗教正统派对抗和论争的重要时期。在布莱斯劳,以盖革为代表的改革者同以提克汀为代表的传统势力为争夺宗教领导权发生激烈争执并最终决裂。汉堡会堂依据新的时代精神编订的祈祷书引发了在宗教观念和仪式变革方面的大讨论。而在法兰克福和柏林,激进的宗教平信徒试图创设一种新的脱离拉比犹太教机制的宗教生活方式。上述争论和变革激励了改革力量的成长并为犹太教改革派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犹太教;改革;正统派;论争

从 1812 年解放法令颁布以来,犹太教在普鲁士被定义为一种受到宽容的宗教,国家并不干预拉比对犹太教宗教生活的调整和革新。拿破仑的失败和维也纳会议造成了反动的政治氛围。1819 年,伴随着一片“Hep! Hep!”的喧嚣声,在整个德意志全面爆发了针对犹太人的血腥暴行。^①在法兰克福、维尔茨堡等城市,犹太人再次遭到反犹攻击。这样,普鲁士及其他德意志邦国的解放法令给犹太人带来的希望也走向破灭。1823 年,腓特烈·威廉三世颁布了限制犹太教改革的法令,规定犹太教仪式必须按传统方式进行,不能在语言、习俗、祈祷和咏唱方面有任何轻微的偏离。官方法令声称犹太教信徒不可以获得政府委任的教职,犹太拉比不是年轻人的导师,也不能被看作像基督教牧师那样的宗教导师。^②国家担心犹太教中任何宗派的出现都会对政治稳定构成威胁,于是竭力

* 胡浩,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教授。

① 塞西尔·罗斯 Cecil Roth,《简明犹太民族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黄福武 Huang Fuwu、王丽丽 Wang Lili 等译(济南[Jinan]:山东大学出版社[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1997),419。

② David Philipson, “The Beginnings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15.3 (April 1903), 502-503.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限制拉比改革的权力,政府往往同正统派联合以反对改革。直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普鲁士的政治氛围才趋于宽松,宗教改革在那些没有遭遇传统势力激烈反对的地方重新活跃起来。与此同时,在犹太社区内部,宗教上的争论也渐趋激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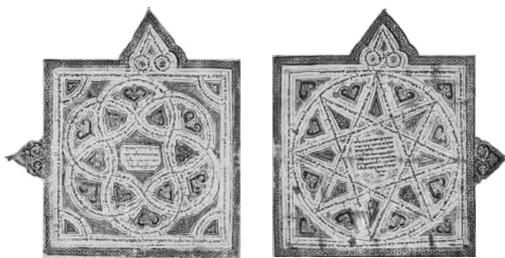
一、布莱斯劳论战

那个时代被认为是改革阵营旗手的亚伯拉罕·盖革(Abraham Geiger)主张宗教理性主义,对以赫尔施为代表的,持传统浪漫主义情结,并希望重建古老犹太教形式的正统派感到不满。然而,盖革没有很快得到那些倡导改革的拉比的普遍赞同。1837年,由盖革召集的威斯巴登拉比会议在改革原则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从实用立场出发,盖革意识到改革必须谨慎而循序渐进地进行。他懂得如何以最佳的方式来推行改革,并对前景保持乐观。^①但在遭遇正统派势力全面进攻的压力下,盖革不得不坚决予以回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布莱斯劳,围绕任命盖革为当地犹太社区助理拉比问题,改革者同传统势力发生了激烈争论和冲突。这场冲突对传统势力构成了严峻挑战,扩大了改革者在犹太社区的影响力。

当时布莱斯劳犹太社区的主拉比亚伯拉罕·所罗门·提克汀(Abraham Salomon Tiktin)是一位严格的传统主义者。他无视时代变化,听不进年轻一代的声音,很难适应新环境。因为传统布道方式越来越受到年轻一代的排斥,布莱斯劳社区想效仿德意志其他一些犹太社区,聘请既接受过大学教育,又精通犹太传统的知识分子承担用本地语言传播宗教真理、指导和教育年轻一代的职责,以满足年轻会众的精神需要。1838年,在社区理事会120名成员的联名呼吁下,社区作出将雇佣一名助理拉比的决定。这名助理拉比除担任拉比法庭的成员外,还负责社区最大会堂每周一次的宗教布道。盖革被认为是最佳人选,他既是一名卓越的《塔木德》和拉比文献学者,同时也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他主张适应时代要求,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变革宗教习俗和仪式,修正或废除那些违背现代宗教精神的礼仪,保留那些同现代生活协调的礼仪。1838年7月,盖革在布莱斯劳发表了一次激动人心的布道,博得了社区理事会大多数成员的赞扬。随后,他被选为布莱斯劳犹太社区的助理拉比。

盖革的当选遭到提克汀的反对,他猛烈攻击自己的这位助手,因为后者在礼

^① Max Wiener ed., *Abraham Geiger and Liberal Judaism: The Challeng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62), 16.



拜中引入了定期布道、本地语言祈祷文、牧师袍和其他一些革新。^① 以提克汀为代表的传统势力和往常一样,试图通过政府的干预来取消对盖革的任命。但是,普鲁士政府对犹太社区内部事务逐渐失去兴趣,当时德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家瑞赛尔(Rieser)公开表示对盖革的支持。1840年,盖革最终获得了助理拉比的任职。在得到政治权威认可后,盖革回到布雷斯劳,他在任职后的首场布道中指出,犹太教是一部没有完结的传奇,目前的形式应当进行改革;犹太教只有更新自身,才能够在现今世界中取得更高和更有利的地位。所有人都应当在这一事业中团结起来。^② 盖革在布雷斯劳会堂的德语布道虽然不是一种创新,但也绝不是一般性的仪式布道。这种类型的布道不仅提供宗教教育,而且提供一般性的教益。在任职期间,他还为年轻人开设新的宗教课程,发表关于犹太历史和文献的演讲,并继续创作活动。

提克汀则坚持他的一贯立场,在实际工作中拒绝同盖革合作。对于以提克汀为首的传统主义者而言,构造一种与祖先不同的犹太教新框架是荒谬的,他们更不会对盖革所谓的历史进化理论抱有兴趣。提克汀对传统的信仰丝毫不比盖革对于改革的信念弱。他坚持认为恪守犹太教意味着要坚持《塔木德》的每一项规定,无论它们是多么不切实际;宗教发展不应受制于时代环境;宗教文献中规定的一切都是神圣的;从作为拉比犹太教基石的《塔木德》中清除任何内容都是对整个犹太教的侵害;任何拒绝《塔木德》有效性的人都不是犹太教真正的信徒。^③

盖革也绝不屈服,在同以提克汀为首的传统主义者的争论中,表现出巨大的热情与活力,他不满足任何既定真理,具有强烈的改革和革命冲动。^④ 为反击提克汀的传统言论,盖革在《犹太教神学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当前任务》的文章,声称布道是知识进步和伦理教育的有效途径,同时,新一代有权在祈祷仪式、会堂音乐等方面进行变革。就像《塔木德》先贤可以根据他们所处时代的宗教真理来理解和诠释经文一样,盖革认为自己也拥有自由释经的权利。他对犹太教的理解常常建立在参照历史的基础上。当审视《1232年到1306年哲

① 大卫·鲁达夫斯基 David Rudavsky,《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Modern Jewish Religious Movements],傅有德 Fu Youde、李伟 Li Wei、刘平 Liu Ping 译(济南[Jinan]: 山东大学出版社[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1996),184—185。

② David Philips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II,”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16.1 (October 1903): 48.

③ David Philips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II,” 49.

④ Max Wiener, “B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Abraham Geiger,” in *Abraham Geiger and Liberal Judaism: The Challeng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2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学研究论战史》时,他感到自己正在呼吸那个时代的气息。在对 10—12 世纪阿拉伯世界犹太人《圣经》评注和希伯来诗歌的研究中,盖革看到了理性和智慧的光芒。当哲学家和宗教批评家鲍威尔攻击塔木德犹太教时,盖革回应说会堂内部的争论不是宗教走向衰败,而是走向复兴的征兆。他声称应当结束律法与实际生活脱节的状态;他将这种脱节归因于犹太教落伍于时代精神。因此,思想的重构对未来犹太教意义重大。^①

布莱斯劳争论很快超出了地方争论的范畴,成为改革原则同传统犹太教原则产生根本分歧的体现,这种分歧甚至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盖革恪守对《塔木德》和拉比文献的科学批判路线,而提克汀及其支持者则恪守蒙昧主义和教条主义路线,两者之间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自由主义同宗教权威的斗争。

1840—1842 年是传统力量与改革力量的相持阶段。1842 年,提克汀和他的同事在一本回应布莱斯劳争论的小册子中斥责以盖革为代表的改革者严重背离犹太教基本立场。他们宣称《塔木德》是所有犹太教教义的宝库和灵感之源,拒绝任何思想自由和宗教质询的权利。^② 根据这些拉比的观点,犹太教是一种固定的、不可变更的系统。《布就筵席》中的每一个微小的律法规定都与《圣经》中的宗教诫命同等有效。柏森的主拉比所罗门·埃格尔(Solomon Eger)宣称,只有完全信赖西奈神启、永远遵守摩西律法的人才是真正顺从上帝的犹太人;摩西将上帝启示给他的口传法和成文法一起传给了他的继承者约书亚,约书亚又将之传给犹太长老,之后又传至先知那里,先知又将其传给了大会议成员。口传律法同样是神圣的,必须得到遵循。否认这一点的人就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犹太人。^③ 里萨的拉比在回应中表示:“所有包含在《摩西五经》中的诫命和禁令以及《塔木德》所诠释的律法都有神圣的起源,对任何时代的犹太人都有约束力,不可人为废止。”^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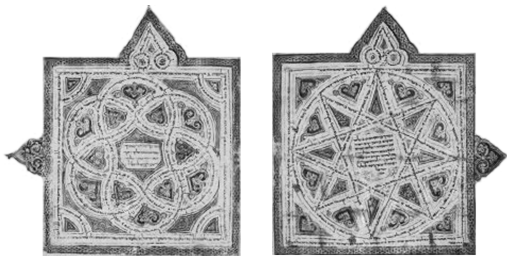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这段时期,受传统势力与改革者论战的影响,拉比法庭没有开庭,社区成员要参加宗教仪式只能到邻近社区。在社区一名重要成员的葬礼上,提克汀和盖革都被邀请发表演讲。提克汀致辞后,盖革随即登台演讲,但遭到了提克汀支持者的谩骂,而盖革的支持者也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回击。第二天,社区理事会以不

① Max Wiener ed., *Abraham Geiger and Liberal Judaism: The Challeng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33-34.

② David Philips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II,” 53.

③ David Philips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II,” 53-54.

④ David Philips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II,” 54.



遵守会堂章程为由中止了提克汀的拉比职务。^① 提克汀转而呼吁各邦正统派拉比支持自己。为此,他出版了一部著作,其中收集了大批反对改革的拉比的思想。^② 后来,在政府干预下,提克汀恢复原职。到 1843 年,提克汀去世,盖革随即成为布莱斯劳犹太社区的主拉比,改革者才在布莱斯劳确立起较稳固的地位。

但传统主义者并没有因为盖革担任布莱斯劳犹太社区的主拉比而改变反改革的立场。这场争论最终导致了布莱斯劳犹太社区分裂成两大宗教社团,即传统派社团和改革者社团。1846 年,所罗门·提克汀的儿子被拥戴为传统派社团的拉比。但是,以盖革为代表的改革者并不想因此分裂成一个独立的宗派,盖革希望自己的改革主张能够最终赢得社区大多数人的支持。所以,在策略上,他力图继续维护社区统一性。10 年后,布莱斯劳社区经过妥协制定了一个新的章程,盖革和提克汀的儿子作为社区的两位拉比享有同等权力,由此,社区统一勉强得以维持。布莱斯劳争论使得改革运动逐渐转变为一种宗派运动,产生了我们今天所称的改革派。^③

在布莱斯劳论战中,盖革和他的同事得到了外部犹太社区改革力量的支持。欧洲年轻拉比大多对盖革表示支持。从 1843 年出版的 17 名拉比对于布莱斯劳争论的答问中,很容易看出这一点。这些拉比多数表示要将摩西启示从口传传统中分离出来并以历史论证的方式揭示犹太教漫长的发展和进化史。他们认为,既然早先的制度被后来的制度修正甚至取代,那么进一步改革就不违反犹太教原初的精神。有些拉比认为《塔木德》不总是和今天的道德保持一致,如果《塔木德》内容同当代宗教情感和道德相冲突,那么人们就有权进行改革。^④ 奥登贝格的拉比伯纳德·韦克斯勒(Bernhard Wechsler)在答问中强调现代犹太教具有自由质询的权利。他说,犹太神学需要科学,只有以科学的方式才能澄清观点上的混乱并对主观的、专断性的宗教想象加以限制,由此才能保护宗教免受谬误的侵蚀。教条主义和蒙昧主义违反了摩西精神,阻碍了对宗教精神的理解……提克汀将科学方式在宗教中的应用看作无神论的观念,这完全是对犹太教的误解。犹太教神学既不是沉思的哲学,也不是教条主义。它谨慎地将历史和批判的方法应用于对传统的理解,并从中得出实际结论。通过对传统的调查,人们发现,有些宗教传统已经被时代淘汰。任何理解历史和人类发展进程的人都必须

^①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11.

^② 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185。

^③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111.

^④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113.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承认传统受到腐蚀的可能性,都应当感谢科学在纠正宗教蒙昧方面的贡献。提克汀因为盖革在科学上的伟大成就而认为他不适合承担拉比职责显然是极端错误的。^①

泰勒林的拉比亚伯拉罕·柯亨(Abraham Kohn)在与布莱斯劳改革派公会的答问中捍卫了犹太教进步原则和改革的合理性。他指出,当社区正在走向知识进步之时,传统主义者仍然严苛地、顽固地坚持不变性原则,孤立于时代之外,严重阻遏了犹太教健康而有效地发挥自身作用……犹太教的全部历史已经证明,在拉比犹太教风俗和律法方面进行变革不仅是允许的,也是犹太教在所有时代的准则。尽管后塔木德时代的宗教导师很少敢于主动变革,但是犹太生活本身的环境不断发生变化,拉比正是顺应时代要求核准了一些重要变革。自《密释纳》编纂以来,宗教律法的变革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是缓慢、悄悄地进行着。过去60年发生的变化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历史积聚起来的变革在特定环境下爆发的结果。因为,在这几十年里,变革的障碍正被清除,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已经得以改善,犹太青年开始在现代学校接受良好教育。所有这些都产生了新的需要和观点。不幸的是,《塔木德》学者仍然孤立变革的世界之外,不积极去评价和欣赏这些变革。^② 特里尔的主拉比约瑟夫·卡恩(Joseph Kahn)对传统势力反对德语布道进行了批判。这是在雅各布逊和克雷用德语布道25年之后发生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最后一次争论。他指出,用德语布道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趋势,就连最没文化的人在德语布道中也受到了教育。人们蜂拥着去听会堂中用纯正德语发表的演讲,感到快乐和精神振奋,甚至一些守旧的、德高望重的拉比也开始尝试用德语发表演讲。政府官员也希望犹太会堂用德语布道,他们经常去聆听这样的布道,从而增加了对犹太教的了解。卡恩对正统派自以为是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改革者正在促进宗教进步。^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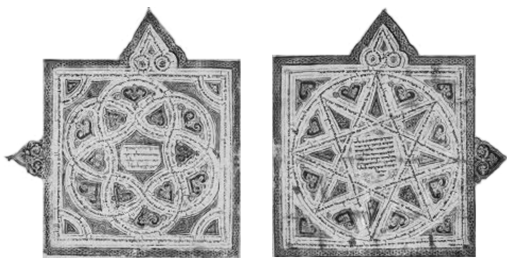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二、汉堡祈祷书引发的争论

在布莱斯劳改革者与传统势力发生巨大争论的同时,汉堡改革也获得重要进展。1841年,在汉堡犹太社区贫困儿童免费学校举行的25周年纪念活动上,布道者克雷提供的晚宴菜单包括很多违反犹太饮食法规定的食品,如蟹、虾、猪

① W. Gnuther Plaut, *The Rise of Reform Judaism: A Sourcebook of Its European Origins* (New York: World Union for Progressive Judaism, LTD., 1963), 64-65.

② W. Gnuther Plaut, *The Rise of Reform Judaism: A Sourcebook of Its European Origins*, 65-66.

③ W. Gnuther Plaut, *The Rise of Reform Judaism: A Sourcebook of Its European Origins*, 67-70.



肉等,与会的大多数犹太人并没有对此表示抗议。这表明,随着改革势力的增强,汉堡犹太人已经开始公开地忽视饮食法的规定。尽管此举激起了传统势力的强烈不满,但使得汉堡会堂与传统势力陷入冲突的真正原因是会堂希望获得社区领导权,并要求建立新会堂。这一主张遭到了社区理事会和传统精神领袖艾萨克·柏奈斯(Isaac Bernays)的公开反对。柏奈斯认为汉堡会堂正在散布对传统宗教的漠视,试图削弱宗教律法,无视以色列民族的理想和抱负。尽管遭遇反对,汉堡议会仍在1841年批准了汉堡会堂的请求。

这一时期汉堡会堂最重要的工作是编订了新的祈祷书。新祈祷书受到了19世纪30—40年代时代氛围的影响,强调遵循历史、实证、批判的原则开展宗教仪式方面的改革,希望以此保证犹太教存在和行动的特征。新会堂(被称为“Temple”)体现的价值完全不同于传统犹太教。它的组织者以宗教进步为口号,强调区分犹太教的核心和外壳、内容和形式、永恒性要素和暂时性要素。^①汉堡祈祷书删去了许多关于弥赛亚将以色列人集结于锡安的祈求,并且用灵魂不朽取代了肉体复活的传统观念。汉堡的正统派拉比否定了这本书并禁止使用。^②新的祈祷书对社区正统派在律法和仪式问题上顽固坚持的宗教激进主义立场提出严正警告,认为那些因为改革者没有按照古老祈祷书践行全部宗教仪式而否认他们的犹太性,并且将仪式上的变革看成异端和叛教的人,实际上是在毁灭犹太教,这样的人最终也将被历史抛弃。^③

但是,为了维持社区统一,新的祈祷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守和折中的特征。新的祈祷书主要着眼于对原有祈祷书进行修订,而不是贸然引入新的仪式变革。编撰委员会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上面提到的实证历史的原则;二是祈祷书的精神和要旨必须符合欧洲文化和生活观念;三是现存的和传统上被接受的内容将优先保存下来,只要这些内容不在根本上与上面提到的原则相抵触。祈祷书必须体现纯粹的犹太一神教教导。^④很显然,上述原则比较模糊,主要考虑到过于明确的改革原则可能会让许多会众无法接受,并使新会堂在犹太社区陷入孤立境地。他们只得选择一种中间路线而避免任何极端。为照顾传统情结,祈祷书重新引入了希伯来文的赞美诗,增加了日常仪式和餐后祝祷词。只是在献

① W. Gnuther Plaut, *The Rise of Reform Judaism: A Sourcebook of Its European Origins*, 40-41.

② 罗伯特·塞尔茨 Robert M. Seltzer,《犹太的思想》[*Jewish People, Jewish Thought: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History*], 赵立行 Zhao Lihang、冯玮译 Feng Wei 译(上海[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586.

③ W. Gnuther Plaut, *The Rise of Reform Judaism: A Sourcebook of Its European Origins*, 42.

④ David Philips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III,”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16.3 (April 1904): 491-49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祭仪式、安息日和犹太节日的附祷等问题上才表现出同传统明显的差别。新祈祷书竭力消除弥赛亚的民族特征,强调其普世性意义,还有意忽略了回归锡安和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和以色列国等内容,表明新会堂努力淡化犹太民族意识。不过,祈祷书还是保存了传统的复活、拯救、弥赛亚、返回锡安等观念,也留存了不少反映个人拯救和重建圣殿的祈祷词。这反映出新会堂在处理犹太身份问题上的矛盾立场。一方面,因为犹太人是德国公民,所以会堂必须斥责犹太人将巴勒斯坦当作自己故乡和祖国的观点;另一方面,作为以色列人,会堂仍怀着焦虑和不安之情表达了回归锡安的梦想。^①

尽管新祈祷书的内容已尽可能地体现与传统的妥协,但还是激起了传统力量的激烈反对。拉比柏奈斯发表声明,认为新祈祷书违反了传统犹太教拯救、弥赛亚和复活三大基本观念,是无效的。^② 柏奈斯的声明在社区激起了骚动和不安。会堂当局于1841年10月21日也发表了一份反对柏奈斯的声明,指出柏奈斯无权公开谴责会堂;柏奈斯对于会堂祈祷书的恶毒攻击缺乏根据,忽视了神学和宗教礼仪方面的基本知识。会堂理事会认为此举极不明智,是一种没有力量的宗派观点,在社区播撒了分裂的种子。^③

为了进一步回击正统派对于新祈祷书的指控,会堂理事会像布莱斯劳改革者一样,力图从外部获得关于祈祷书内容和性质问题的权威观点。在理事会的积极努力下,会堂获得了12位知名拉比撰写的问答并以文集形式出版,这就是《关于汉堡新以色列会堂协会祈祷书的神学观点》一书。会堂发言人弗兰克尔博士声称,12位拉比权威的分量显然超过传统主义者毫无根据的声明,有力地证明了会堂祈祷书的合法性。^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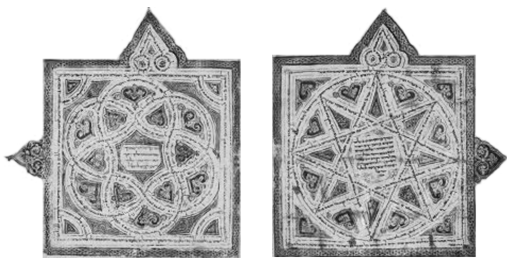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在这12位拉比的问答中,塞缪尔·侯德海姆(Samuel Holdheim)和艾萨克·曼海姆(Isaac Noa Mannheimer)两位拉比的观点比较引人注目,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改革思想中激进和保守的方面。侯德海姆主要是从传统、现代性和文化适应关系的角度捍卫了祈祷书的合法性。在题为《汉堡新以色列人会堂祈祷书》的小册子中,侯德海姆宣称祈祷书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可以为任何犹太会堂使用。因为祈祷书没有诋毁任何历史真理和根本的犹太教教义,也没有破坏会堂传统,更没有废除任何受到普遍认可的《圣经》律法和拉比法令。它执行的

① See David Philips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III," 495-496.

②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116-117.

③ David Philips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III," 493.

④ David Philips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III," 494.



是一种中间路线,既满足了激进派的要求,也满足了保守派的需求……按照侯德海姆的观点,这部祈祷书没有任何颠覆犹太教精神的变革。祈祷书强调了先知对于犹太教教义的阐释,将传统犹太教精神同普遍的宗教信条结合在一起,而且成功地排除了那些与现代文化精神和纯粹的宗教教义相悖的内容。^①

维也纳布道者曼海姆本质上是一个持保守立场的人,但对汉堡祈祷书表示拥护。他从传统中寻找变革根据,认为祈祷书用本地语言代替希伯来语,从《塔木德》和拉比犹太教的立场来看,是无可辩驳的。改革是每一座会堂的权利。有些祈祷词只是祈祷书编纂者个人意志的表达,因而不具有永恒的有效性和权威,废除或删节它们没有违反任何宗教准则。他赞同祈祷书忽略献祭内容,在他看来,献祭并不是实现弥赛亚的必要条件,只是以色列宗教早期阶段的产物。不过,他又表示自己相信并捍卫对弥赛亚信条的民族性阐释,希望看到民族重建。^②

汉堡祈祷书为迎合社区情感,在原则和内容上显得并不连贯,时而激进、时而保守,激起了改革者的不满,并引发了观点上的争论。像盖革和弗兰克尔这样受到历史主义和学术批判思潮深刻影响的宗教思想家,希望新的祈祷书能够明确表达他们的立场,而不是为照顾不同会众的宗教需求,在仪式改革问题上妥协和折中。弗兰克尔批判了柏奈斯僵化的传统主义立场,他指出,汉堡祈祷书之所以受到公开批判,是因为作者没有遵循严格的程序;他们在保留和删节祈祷仪式方面采取的是一种不具有权威性的折中原则。在他看来,祈祷书在科学、严肃性和激发宗教情感方面是失败的。祈祷书显得反复无常,在很多方面忽视了犹太社区的宗教情感。如在弥赛亚问题上,弗兰克尔认为,回归巴勒斯坦的希望始终能够激发犹太人的情感和热情,这一目标的实现意味着以色列弥赛亚希望真正完美的实现。^③ 弗兰克尔认为,祈祷书没有尊重科学要求的客观性和连贯性原则,也没有遵循宗教情感要求的主观现实性原则。^④ 显然,弗兰克尔在仪式改革问题上更强调宗教情感,认为新祈祷书过于激进。

在仪式改革问题上,盖革与弗兰克尔一样,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历史主义的路径。但是,出于对历史主义的不同理解,他们在改革问题上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盖革注意到祈祷书缺乏连贯性和原则性,他对汉堡会堂的妥协举动表示不满。他认为,会堂不应受到社区多种因素的束缚,而应当成为宗教改革的领

① David Philips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III," 499-500.

② David Philips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III," 501.

③ David Philips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III," 502.

④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118.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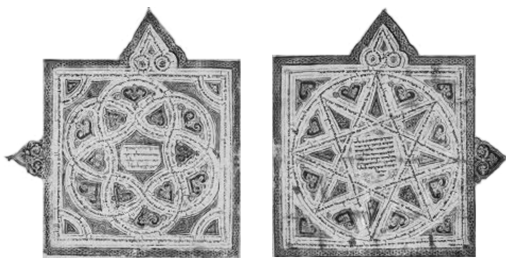
导力量,反映那些在知识上和情感上都从陈旧教条中解放出来的会众的要求,会堂改革应指向现在和未来。盖革认为在坚持科学原则和主观精神诉求方面,祈祷书显得很不够。盖革和弗兰克尔在汉堡祈祷书问题上的分歧不仅是改革运动随后将要出现的严重分裂的征兆,也表明学术在提供一种可以被广泛接受的仪式改革路径方面是无能的,至少是不充分的。^①

尽管汉堡祈祷书是围绕仪式问题展开的,但它引发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仪式改革的范畴,反映了宗教观念上的分歧和争论。这种分歧不只是改革力量同传统势力在宗教理解方面的差异,还扩展到改革阵营内部。改革者的主要分歧在于改革的动力、原则和目标,即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或者传统,还是来自外部或者现代观念;改革的原则是基于情感主义,还是基于完全的理性主义;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律法和仪式的变革,还是要实现教义上的根本变革。围绕汉堡祈祷书的争论预示了改革力量内部可能出现的更为严重的思想分裂。

布莱斯劳和汉堡的改革遭到社区传统拉比的激烈反对,在改革者内部也引发了争论。汉堡祈祷书在精神上的不连贯性和妥协性显示改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德国犹太社区在宗教上浓郁的保守氛围使得改革被迫转向温和。多数改革者开始从塞法迪犹太传统中寻找变革的证据,强调改革并不破坏犹太延续性,更没有否定犹太历史和传统,而是旨在更新和重新解释传统。所以,改革者也不试图形成一个独立的宗派,只是在尽可能地影响犹太社区,劝说传统主义者最终接受改革主张,以推动整体宗教进步的实现。但实际这一想法只是一厢情愿,改革者掀起的革新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在德国一些较大的犹太社区,宗教平信徒对依靠拉比来推行改革越来越没有耐心,于是,他们开始绕开拉比的干预,掀起更加激进的宗教变革。按照迈耶尔的观点,这一现象的出现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19世纪40年代,德国犹太人中有了充分德国化和欧洲化的新一代。他们不像前代人在宗教问题上表现得较为传统。他们年轻时在基督教学校和大学学习,当再次返回犹太社区时,感到自己和大多数犹太人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正是这些人在社区中形成了激进力量。一方面,他们受到反犹和反宗教潮流的影响,对自己的犹太出身表现出非常矛盾的态度。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憎恶自己的犹太出身,因为它妨碍了他们社会抱负的实现。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现出对同胞的依恋之情,感到有责任反对歧视,捍卫犹太人的利益。^②

①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118.

②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121-122.



三、激进改革风潮

在拉比阵营致力于改革并就改革问题发生激烈争论的同时,在法兰克福和柏林出现了更加激进的、具有强烈世俗化倾向的改革势力。一是法兰克福的“改革者联谊会”(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Reform)提出“在弥赛亚宗教中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并断然否定了《塔木德》的权威性。二是柏林的“犹太教改革协会”(Association for Reform in Judaism)要求几乎全部用德语作祈祷,并废除了一些被认为陈腐的和东方式的习俗,如在新年蒙着头、吹着羊角号作祈祷。^①

法兰克福在 19 世纪 40 年代成为激进改革者活动的基地。这些改革者最初活跃在法兰克福人道主义学校教师米海尔·克赖策纳赫(Michael Creizenach)^② 的周围,他们后来成立的改革者联谊会表达了激进的宗教改革主张,并持有这样一种信念,即今天犹太教大多数的仪式和诫命都是因特定时代和特定人群需要而产生的。现在,这些内容已经构成对纯粹宗教的危害,丧失了意义,通过拉比权威和家庭约束来继续维系这些诫命和仪式是不道德的。犹太人不应因为外在的宗教形式而束缚了对信仰的思考。现代犹太人应当将对犹太教精神信念的追求同他们的职业生活结合在一起,有必要清除那些成为职业和生活障碍的古老风俗和诫命。改革者联谊会的成员呼吁拉比支持他们追求真理的主张,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主张本质上是道德的,能够取悦上帝。

改革者联谊会提出了三条纲领:一是摩西宗教在不断进步;二是所有在《塔木德》基础上引发的争论、推衍的律法及产生的宗教文献都不具有权威性;三是不希望也不期待弥赛亚的到来,不希望弥赛亚引导以色列人返回巴勒斯坦地,除了犹太人生长其中并承担公民义务的国家之外,犹太人没有其他的祖国。改革者联谊会在仪式问题上提出了激进的主张,其绝大部分成员都认为犹太割礼是一种过时的、野蛮的宗教仪式,必须废除。这一主张遭到以拉比所罗门·特里尔和拉波波特为首的传统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将联谊会定位为宗派主义,其目标是要消灭拉比犹太教。拉波波特严正警告教友们不要同该协会的成员有任何接触,特别是不要同他们有任何婚姻上的联系。^③

即便在改革阵营中,改革者联谊会如此激进的宗教观点也遭到反对。因为

^① 罗伯特·塞尔茨,《犹太的思想》,586—587。

^② 米海尔·克赖策纳赫是著名的塔木德主义者、现代教育家。他一度想赋予改革派理论上的定位,同盖革一样,他没有完全否定《塔木德》的有效性并坚持犹太历史的统一性原则。

^③ W. Gnuther Plaut, *The Rise of Reform Judaism: A Sourcebook of Its European Origins*, 50-52.

JEWISH STUD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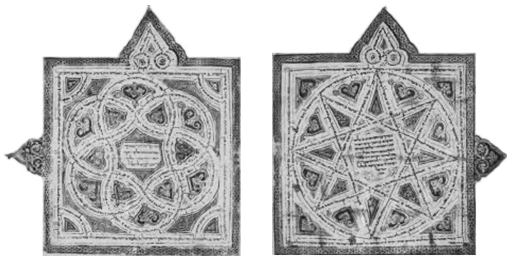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犹太研究

第19辑

改革者联谊会几乎完全放弃了犹太教中启示的观念,这似乎又回到了激进哈斯卡拉的自然宗教观。代表大多数改革拉比立场的蔡德威茨(Zedwitz)对改革者联谊会进行了批判。他说,如果犹太教不是被启示的,那它是什么呢?启示宗教的原则在摩西和先知作品中就已确定下来。神圣性在为人类提供思想和行动的准则。最高精神不能够通过人的理性获得。人们不能从凡人那里获得神圣真理,不论这些人是多么出色;人们只能从上帝启示的教导中获得灵感,因为上帝将真理传给了摩西和先知以拯救以色列和全人类。^①那个时代多数改革者已经具有较为明确的宗教自觉意识,即宗教改革并不否认启示的有效性,而是在承认神圣性的基础上强调人类理性的重要性。与拉比阶层相比,激进平信徒掀起的宗教革命在犹太社区处于一种边缘性和极端性的存在状态(法兰克福的改革者联谊会规模一直很小,其中积极活动的会员又不超过一半),并没有得到大多数犹太人的支持。改革者联谊会的主张最终没有为主流改革阵营所接受,但是它对于改革运动的意义超过了其规模,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德国犹太教改革运动的进程并促使改革者进一步澄清自己的观点。

与法兰克福宗教平信徒发起的激进变革相比,柏林宗教平信徒在19世纪40年代掀起的改革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法兰克福,而且在德国宗教改革圈产生的影响也更大。柏林这个孕育哈斯卡拉的城市,自18世纪末以来一直就是德国犹太文化的中心,也是犹太商业和知识精英的荟萃之地,他们在思想上受到现代世俗文化和科学的深刻影响。在柏林大学,尽管犹太人不能担任教职,但是那里还是聚集了一批改宗了的犹太人,他们在宗教上持相当激进的观点。而在犹太社区,犹太学校的入学率并不高,柏林犹太儿童多半在非犹太学校上学。犹太社区委员会一般为富人和精英阶层所控制。他们不关心宗教问题,也不守教或者很少遵守犹太律法,乐于将宗教问题交给传统犹太人去处理。但是从19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柏林传统犹太社区也开始了一些宗教仪式上的变革。1844年,社区任命具有一定革新倾向、但总体上坚持保守立场的米海尔·萨赫斯(Michael Sachs)为助理拉比和布道者。这一事件激起了柏林犹太社区宗教平信徒的抗议。超过200名社区成员抗议这次任命。他们希望任命像盖革这样的改革者担任助理拉比。柏林犹太社区的变革受到那个时代德国基督教改革的影响。19世纪40年代早期,在德国新教和天主教中,出现了一些试图革新传统教义的运动,如在新教中的新教徒联谊会。该组织奉行激进的个人主义原则,认为信仰取决于个人的心灵,而不是文本或者教会的条文。天主教中的宗教抗议者称自己为“德国天主教徒”,拒绝尊崇古老的宗教传统,不服从教宗,并准备召开

① W. Gnuther Plaut, *The Rise of Reform Judaism: A Sourcebook of Its European Origins*, 53-54.



更具代表性的宗教会议。这些组织带有强烈的民主和反教权倾向。受其影响，柏林的一些犹太教信徒也试图突破传统犹太教框架，掀起新的宗教运动。^①

这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西格蒙德·斯特恩(Sigismund Stern)，受到那个时代流行的黑格尔哲学以及施莱艾尔马赫宗教浪漫主义的影响，决心彻底地将犹太教融入当代德国文化之中。1843—1845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演讲，受到了年轻犹太人的广泛关注。斯特恩反对黑格尔所谓犹太教是历史遗迹的观点，认为虽然犹太教不再拥有自己的政治基础，但能够成为普鲁士国家中活生生的一支力量。犹太教如果经过适当重构，就能在世界历史中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并能在国家发展和人性进步的过程中扮演有价值的角色。犹太人要进入当代文化圈并不必然将犹太教置于一种边缘地位。斯特恩希望犹太教成为像新教一样的德国教会，这意味着一方面犹太教将获得像新教一样的公共认可，另一方面犹太教将排除伦理一神教普世内容之外的一切礼仪性和民族性因素。尽管斯特恩认识到柏林的拉比和社区领导人不会支持如此激进的变革，但是他认为自己将作为改革先锋将启蒙引向深入。^②

对这场运动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位理论家是亚伦·伯恩斯坦(Aron Bernstein)。他也认为犹太教只有经历激进的转型，才能够有意义地生存下来。与斯特恩不同，尽管决心和传统犹太教决裂，但他对传统犹太生活仍然有依恋之情。他在关于当代犹太教的作品中勾画了一种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犹太教形象：那就是犹太教三代人悲剧性的分裂。按照他的话说：“父亲不能理解我们，而我们的孩子也不能理解我们。”他赞成激进改革的理由是当代犹太人不得不面对处在现代文化和思想影响下的下一代犹太人，必须为他们光明的未来考虑，必须以信心、勇气和热情，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后代犹太人的生活奠定基石。所以，伯恩斯坦认为，犹太人不能坐等犹太教进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而是要主动促进新时代的到来。他认为，主张改革的拉比对于犹太教的批判主要针对《塔木德》和拉比文献，而在对《圣经》启示的批判方面止步了。伯恩斯坦强调《摩西五经》不是宗教启示，任何神圣文本都不具有超自然的地位。这一对待启示的态度成为激进宗教平信徒同改革派拉比的最大差别。^③

1845年3月10日，大约30名宗教平信徒在柏林犹太文化协会的会客厅开

^①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123-124.

^②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125-126.

^③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126-127.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会,讨论有关犹太教的重大问题并选举了一个工作委员会。4月初,28名年轻人再次集会并签署了《对我们德国教友的呼吁书》(*Appeal to Our German Coreligionists*)。《对我们德国教友的呼吁书》指出了变革中的宗教意识与拉比犹太教传统是不相容的,认为有必要决定传统中哪些因素与时代精神相适应,哪些因素与之冲突。《对我们德国教友的呼吁书》声称,该组织的年轻人将自己作出宗教问题上的决定并召集宗教会议决定新的犹太教的形式和内容。《对我们德国教友的呼吁书》声明忠于犹太教并需要积极的犹太教。《对我们德国教友的呼吁书》采纳了伯恩斯坦的观点,即信仰上帝只是意味着信仰先祖的精神,而不是直接信仰《圣经》启示的内容。^① 犹太教经文不具有神圣性,相反,它是一种流动的信仰,渗透在犹太个人和集体的生活中。信仰和习俗总是会发生变化,不应为巴勒斯坦的弥赛亚王国而祈祷,这些早先时代的风俗已经归于无效。

不过,该组织的成员不想同那些不赞同他们观点的犹太同胞分离开来,他们的目的是汇聚那些持相似观点的犹太人,并通过他们来更新犹太教的形式,使之满足他们和他们孩子的需要。呼吁书第一次集体声明决定犹太教命运的是当代宗教意识,而不是经文、传统和历史进化。犹太教最终的生存标准应由改革的犹太人来决定。宗教应该满足当前的需要。精神不是出自书本,而是源自生活本身;宗教信念在灵魂之中而不在科学之中……真正的虔诚是尊重过去并珍视其意义,目的在于确认当今的权利。^② 这一立场既完全不同于正统派,而且与像盖革和弗兰克尔这些进步拉比所寻求的对犹太教的历史定位也有根本差异。^③ 在盖革看来,研究犹太教的历史,主要是研究犹太教的精神成就。犹太人的历史也主要是一种精神的历史,其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在犹太教的发展和演变中得以体现。^④ 弗兰克尔倡导的实证—历史学派侧重于对拉比文献作全面、深入、具体的研究,显示出对律法进化的特别关注,并视之为揭示犹太教本质和民族精神的方式。^⑤

1845年夏,在斯特恩的领导下,柏林激进的宗教平信徒建立了犹太教改革协会。他们决心同传统思想决裂,但力图维持与犹太同胞之间的宗教纽带。1845年举行的犹太新年仪式吸引了超过600名犹太人参加,有些人几十年都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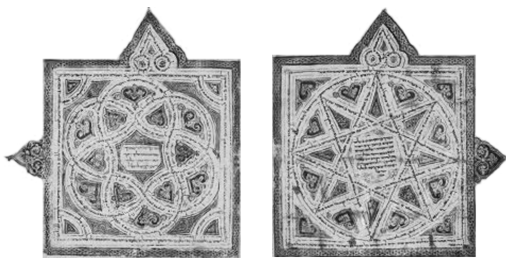
① W. Gnuther Plaut, *The Rise of Reform Judaism: A Sourcebook of Its European Origins*, 57.

② W. Gnuther Plaut, *The Rise of Reform Judaism: A Sourcebook of Its European Origins*, 56.

③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128.

④ Abraham Geiger,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Judaism," in *Abraham Geiger and Liberal Judaism: The Challeng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 Max Wiener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62), 155.

⑤ 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211。



有参加过任何宗教仪式。这次仪式效仿的是德国教堂的模式,男子和女子都坐在大厅里。大多数男子都不戴无边圆帽,更不戴祈祷披巾。协会祈祷书效仿汉堡祈祷书,尽量做到简化,摒弃了一些不合时宜的繁杂仪式,认为选民观念只是反映犹太民族宗教意识的一种主观事实;犹太民族同上帝立约,在道德上肩负着比其他民族更为重大的责任,那就是践行上帝之道,帮助其他民族获得拯救。但在客观上,选民观念已经丧失了有效性,部族神圣性以及特殊使命的观念已经与当今时代格格不入了。人类被上帝遴选是因为人类的美德和公义。^①

协会祈祷书认为,启示是犹太先辈精神的展现,但本身并不超越人的能力范畴,通过超自然事件获得的启示正好与我们的宗教信念一致,因而它实际上是一种活生生的信仰的表达。这种主观的信仰充满着内在真理的力量,而上帝启示给犹太先辈的也正是这些真理。只有在一种活生生的当下的意义上,犹太人才能深切地感受到启示的力量。“十诫”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启示的庄严,而是因为它们展现了人类精神和道德的神圣性。人类精神乃是评价启示重要与否的最终标准。在知识和情感上同祖先的一致性是犹太人与其先辈保持历史联系和精神纽带的依据。在祈祷中引用《圣经》文本,是因为这些文本反映了永恒的人类精神,反映了坚定的宗教信念。祈祷书强调,在祈祷仪式改革方面,带有民族倾向的、狭隘的教义因素应让位于普遍的宗教意识。新的祈祷书旨在复兴犹太教中具有永恒价值的宗教精神,保证了犹太教虽历经磨难,但仍得以延续和传承。祈祷仪式只是这些永恒精神和要素的象征和展现,旨在强化宗教虔诚和信念,此外并不具有任何本质上的意义。^② 宗教布道成为祈祷活动的重要内容,《托拉》用希伯来语诵读,同时有德语翻译。在赎罪日,人们并不需要斋戒。不过,这一新组织的宗教仪式仍然保留着一些传统因素,如上帝的审判、以色列的遴选、西奈的启示,惩罚与报偿甚至是死者复活。这些同民族历史相联系的仪式遭到了一些成员的反对。

协会决定每周在固定时间举行宗教仪式,但就选在星期六还是星期日的问题发生了争论。最后成员之间达成了妥协,即那些能够在星期六参加仪式的人就在星期六举行仪式,那些因为实际情形不能在星期六参加仪式的人,可以在星期天举行仪式。但是,在几年之后,星期六仪式逐渐被废弃。协会因此成为第一个专门在星期日举行宗教仪式的欧洲犹太教公会。^③

^① W. Gnuther Plaut, *The Rise of Reform Judaism: A Sourcebook of Its European Origins*, 58.

^② W. Gnuther Plaut, *The Rise of Reform Judaism: A Sourcebook of Its European Origins*, 59-60.

^③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129-130.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布莱斯劳和柏林宗教平信徒掀起的激进改革风潮存在一定差异。在布莱斯劳,平信徒激进的宗教运动在经历了短暂的狂热之后,很快被纳入了拉比宗教改革的框架之内,他们最终接受了盖革的建议,即在原有的宗教框架下作为激进改革的力量而存在,而不是创造一种独立的宗教体制,同拉比阶层和社区决裂。但在柏林,激进平信徒的改革运动同主流宗教社区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它希望创建一种新的宗教体制并试图通过召开宗教会议的方式来获得认可。甚至它的领导人斯特恩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希望将德国所有激进改革者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德国犹太教会。^①而社区理事会在要求这些激进人士继续支付社区租税的情况下,愿意让他们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独立。不过,社区理事会拒绝给予他们任何象征获得普遍认可的宗教荣誉。柏林激进宗教平信徒同主流犹太社区一直存在紧张的关系,他们甚至一度形成了独立的会堂联盟,并拒绝支付社区的租税,但最终在政府的压力下,被迫屈服。召集宗教会议的努力也一度遭遇挫折。事实上,他们的主张没有得到社区大多数成员的理解和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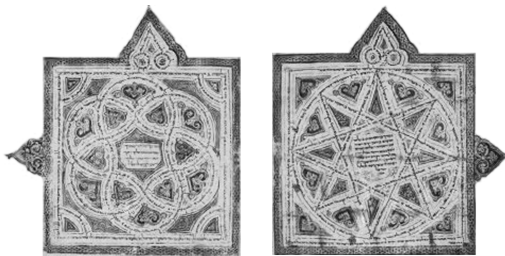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侯德海姆被选为该协会的拉比和布道者标志着激进平信徒的宗教改革最终还是被纳入了拉比改革的范畴,只是作为一支相当激进的宗教改革力量而发挥作用。侯德海姆的主要观点是:犹太教只有适应现代主义,才能在新的环境下求得生存。他主张对以《塔木德》为核心的犹太教进行全面改革,在他看来,《塔木德》所反映的意识形态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当时是正确的,具有凝聚力的,但在我们的时代,它已经失去了生命力,我们应该有更高的意识形态。^②与盖革所倡导的谨慎而温和的改革不同,对于侯德海姆来说,将犹太教中的宗教和伦理内容从政治—民族内容(它不应当成为一种束缚性的力量)中分离出来非常必要,既然犹太人已经成为他们所居住国家的公民。侯德海姆将犹太人的解放看成显示普遍兄弟之谊的弥赛亚时代到来的开端,要求废弃或变革对这一时代造成障碍的仪式性律法,如安息日、割礼、犹太婚姻律法、饮食法、礼拜仪式等。^③侯德海姆在实际改革层面表现激进。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出于犹太人融入国家的需要,他就准备在宗教信仰和习俗上作出妥协和让步。如他认为,在圣殿时代,履行献祭义务比遵守安息日重要,而在现代,神职人员、教师、医生和律师履行自己作为公民的责任比守安息日更重要。^④在不伦瑞克拉比会议上,侯德海姆强调了爱国主

① W. Gnuther Plaut, *The Rise of Reform Judaism: A Sourcebook of Its European Origins*, 55.

② 张倩红 Zhang Qianhong,《困顿与再生:犹太文化的现代化》[Predicament and Rebirth: The Modernization of Jewish Culture](南京[Nanjing]:江苏人民出版社[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140。

③ *Encyclopedia Judaica*, Vol. 14 (Jerusalem: Keter Publishing House Ltd., 1972), 25.

④ *Encyclopedia Judaica*, Vol. 8 (Jerusalem: Keter Publishing House Ltd., 1972), 817-818.



义,认为犹太人首先是爱国者,然后才是犹太教徒和同胞,他们和德国人具有相同的政治使命。^①在法兰克福拉比会议上,侯德海姆指出,弥赛亚不是政治和世俗意义上的,只是宗教和精神意义上的,它表达的是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并获得拯救的希望,而不是摩西神权政治的重建。犹太教使命的实现并不依赖于犹太国的建立。^②

然而,不论布莱斯劳,还是柏林,宗教平信徒进行的激进的宗教改革与18世纪末第二代马斯基尔的激进启蒙相比,已经有了本质上的不同。这些在新的时代和宗教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改革的时候,已经具备了明确的维持犹太身份的意识,他们对犹太教作为理性宗教和普世宗教的认知主要基于对犹太教教义本身的理解和诠释,而非外部思想。这些组织的成员后来极少有改宗者。

尽管激进的平信徒在布莱斯劳和柏林的犹太社区属于极少数,但是他们进行的改革引领了时代潮流,在犹太社区产生了广泛影响。作为新一代接受良好世俗教育、受到启蒙思潮哺育的年轻犹太人,激进平信徒很少受到犹太教传统的羁绊。他们敏锐地将那个时代最新的思想注入犹太教的肌体,赋予犹太教生机和活力。他们的行动沉重打击了他们之前那一代顽固的传统主义者,激起了广大民众改善宗教生活的热情。他们广泛宣传了犹太教的精神和教义本质以及反对犹太民族主义和特殊主义、强调律法和仪式象征性的思想;他们还批评了一些致力改革的拉比同传统势力妥协、畏缩不前的做法,挑战了拉比的领导权威,促使他们不得不加快改革的进程。激进平信徒在启示问题上的激进态度让主张改革的拉比感到担忧,他们感到有必要采取切实行动将改革运动定位在可以控制的神学框架下,避免走向极端化和完全的世俗化。上述考虑促使改革运动进一步明确自身立场和边界,并致力于神学构建和机制化,为犹太教改革派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结语

19世纪30—40年代是德国犹太教改革力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德意志犹太社区中致力于宗教改革的拉比和平信徒共同参与了反对正统派的斗

^① The Reform Rabbinical Conference at Brunswick, "The Question of Patriotism," in *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 A Documentary History*, eds. Paul R. Mendes-Flohr and Jehuda Reinharz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56-157.

^② The Reform Rabbinical Conference at Frankfurt, "The Question of Messianism," in *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 A Documentary History*, 164-165.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争,并在这一斗争中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联合。新的拉比阶层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他们在继续推进早期改革者进行的礼仪和习俗改革的同时,开始认真思考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改革的基本原则、改革采取的批判方法等一系列更深层次的问题。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改革对于维护犹太教在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开始利用“犹太教科学”的观念和框架,废弃犹太教中落后的、僵化的、与现代社会需要不相容的律法和习俗,赋予犹太教像当时德国基督教那样的进步宗教和精神宗教的新形象。尽管这一时期出现的平信徒所发起的激进改革运动试图脱离拉比犹太教的机制,但总体来看,改革仍然被定位在一种谨慎的和相对保守的氛围之中,具有明显的维护犹太教和犹太身份的意图。那些接受了现代教育,同时具备世俗文化和犹太传统知识,并坚定地忠于犹太教的拉比阶层掌握改革的领导权和主动权,这些人延续着拉比犹太教探究信仰、伦理和知识的传统,致力于创造一种现代拉比犹太教的知识体系和组织框架,促进了改革运动朝着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引发了改革阵营内部诸多的争论,对改革派的形成、发展与分化都产生重要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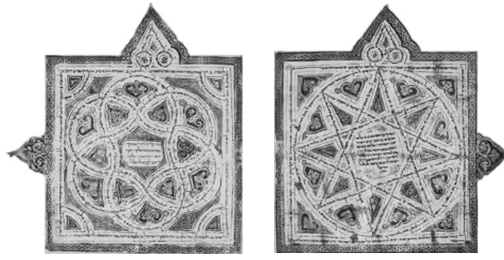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一)中文参考文献

1. 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傅有德、李伟、刘平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
2. 罗伯特·塞尔茨:《犹太的思想》,赵立行、冯玮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3. 张倩红:《困顿与再生:犹太文化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4. 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黄福武、王丽丽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二)外文参考文献

1. David Philipson, "The Beginnings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15.3 (April 1903).
2. David Philips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II,"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16.1 (October 1903).
3. David Philips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III,"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s 16.3 (April 1904).

4. *Encyclopedia Judaica*, Vol. 8, Jerusalem: Keter Publishing House Ltd., 1972.

5. *Encyclopedia Judaica*, Vol. 14, Jerusalem: Keter Publishing House Ltd., 1972.

6. Max Wiener ed. *Abraham Geiger and Liberal Judaism: The Challeng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62.

7.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8. The Reform Rabbinical Conference at Brunswick, "The Question of Patriotism," in Paul R. Mendes-Flohr and Jehuda Reinharz eds. *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9. The Reform Rabbinical Conference at Frankfurt, "The Question of Messianism," in Paul R. Mendes-Flohr and Jehuda Reinharz eds. *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0. W. Gnuther Plaut, *The Rise of Reform Judaism: A Sourcebook of Its European Origins*, New York: World Union for Progressive Judaism, LTD., 1963.